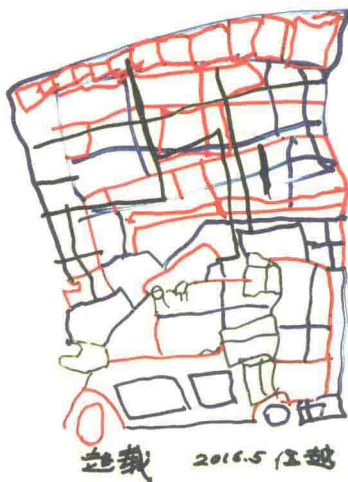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西文化

伍本霞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伍本霞 2016.5 伍本霞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西文化

伍本霞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西文化 / 伍本霞著. — 湘潭 :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87-0111-2

I. ①孙… II. ①伍… III. ①三民主义—关系—东西
文化—研究 IV. ①D693.0 ②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0003号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西文化

SUNZHONGSHAN SANMIN ZHUYI YU ZHONGXI WENHUA

伍本霞 著

责任编辑:李志红

封面设计:周湘兰

封面插图:伍越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南省湘潭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电话:0731-58298960 0731-58298966(传真)

邮编:411105

网址:<http://press.xtu.edu.cn/>

印刷: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9 mm×1230 mm 1/32

印张:8.5

字数:206千字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87-0111-2

定价:24.80元

目 录

引 言	1
-----------	---

第1章 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及其三民主义的中国意义与 世界意义	7
---	---

1.1 西方文化的传入与近代中国的困境	7
---------------------------	---

1.1.1 从本土历史的视野看	9
-----------------------	---

1.1.2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	15
-----------------------	----

1.2 近代东方各国对西方文化之冲击的诸种回应	23
-------------------------------	----

1.2.1 俄罗斯	25
-----------------	----

1.2.2 印度	30
----------------	----

1.2.3 日本	34
----------------	----

1.2.4 中国（孙中山之前）	38
-----------------------	----

1.3 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及其理论贡献	43
---------------------------	----

1.3.1 中西文化与孙中山的所学所思	44
---------------------------	----

1.3.2 孙中山中西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50
----------------------------	----

1.3.3	孙中山中西文化观的中国意义	59
1.3.4	孙中山中西文化观的世界意义	62
第2章	中西文化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66
2.1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66
2.1.1	“革命排满”	67
2.1.2	“五族共和”	74
2.1.3	“大亚洲主义”	79
2.2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中国文化资源	84
2.2.1	“夷夏之辨”	85
2.2.2	“文野之辨”	90
2.2.3	“王霸之辨”	98
2.2.4	“固有的旧道德”	102
2.3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西方文化因素	109
2.3.1	西方民族主义思潮	109
2.3.2	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本性	114
2.3.3	世界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	120
2.3.4	达尔文的进化论	123
第3章	中西文化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129
3.1	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29
3.1.1	“创立合众政府”	130
3.1.2	“五权宪法”	136
3.1.3	“再造共和”	143
3.1.4	“以俄为师”	149
3.2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文化资源	153

3.2.1 民本主义	154
3.2.2 “性三品”说	160
3.2.3 科举与监察	166
3.2.4 “自由”与“平等”	170
3.2.5 儒家的政治哲学	175
3.3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西方文化因素	179
3.3.1 对西方民权思想的借鉴	180
3.3.2 对西方共和模式的借鉴与批判	186
第4章 中西文化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191
4.1 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1
4.1.1 “兴大利以厚民生”	192
4.1.2 “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195
4.1.3 借鉴俄国	204
4.2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中国文化资源	208
4.2.1 “大同”理想	210
4.2.2 “均贫富”思想	218
4.3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西方文化因素	224
4.3.1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225
4.3.2 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	234
4.3.3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	239
4.3.4 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	246
结 语	251
参考文献	260
后 记	264

引 言

孙中山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其革命事业与革命思想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相应地，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成果亦十分的丰硕，以至于部分研究者将之称为“孙学”。

然而，由于近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孙中山研究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特别是在对他的事业和思想作宏观描述和历史评价方面，很大程度上都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作的。比如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革命为时代的主题，故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无可置疑。比如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大半个世纪里，像戴季陶、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给三民主义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显然，诸如此类的研究或诠释，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索，而且也很难走进孙中山的思想深处。

孙中山既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思想家，确切地说是一位用自己的思想引导社会和指导革命事业的时代伟人。因而对其研究，着重点应在他的三民主义，而不在他的革命生涯。而对三民主义，学界的研究成果虽曰丰硕，但仍有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变革、文化

冲突和思想转型诸方面交织在一起，作为立志于引导中国社会走向光明的孙中山，首先是作为思想导师的角色而体现其价值的。因而我们也只有从哲学和文化学的视域深入他的三民主义，才可能看出其思想和革命事业的伟大之处。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考虑，本书才将其论域择定在孙的三民主义同中西两种文化之关系方面，并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孙中山研究深入一步。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同年5月，戴季陶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他通过对孙中山五种主要著作的研读，得出两点结论：（1）孙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2）孙中山思想“是由现代世界的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种种制度上着眼，创制出的新理论”。戴季陶此种观点，成为民国时期对孙中山研究和宣传的基调。蒋介石同戴季陶的观点虽有不同，但在孙中山同儒家思想之关系上，完全与戴季陶保持一致。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配合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在一系列著述中，极力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儒家道统之关系。此后，学术界秉着此种观点而作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有数十种之多。

1949年至“文革”结束后，大陆学界关于孙中山思想定位的讨论仍在继续，但大多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是反封建的，不可能是孔孟儒学的接续。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

1978年以后，大陆学界在消除“左”的思潮的同时，对孙中山的研究亦有了新的气象，肯定了孙中山同传统儒学的继承关系。期间颇有影响的研究人员为任继愈、张磊、李泽厚、萧万源、韦杰廷、张江明、方克立、姜义华、张岂之、李侃、

章开沅、桑兵等人。这些人大多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学者，其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大陆掀起“国学热”以及“读经”的热浪。在此种思潮下，学界更是倾向于把孙中山定位为儒家精华的思想传人。只是相关论著不多，有影响的论著亦为鲜见。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为黄明同于2010年出版的《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一书。不过该书仍是叙述性的，缺乏学理性的分析。

1949年以后的台湾，蒋氏父子为了消除台湾受日本统治而遗留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影响，曾一度兴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孙中山被继续尊为“国父”，三民主义作为官方主题价值体系，被纳入学校教育，作为必修课程。一时间，台湾地区的孙中山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大大增长。据统计，1990年前，概论和研究“国父思想”的著作有七十余种。其中不乏高质量的作品，如张其成的《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周世辅的《国父思想与中国文化》、胡勉的《儒家思想与三民主义》、赵尺子的《三民主义与周易哲学思想》和柳岳生的《三民主义与春秋民族思想》等。这些著作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以孙中山的基本著作作为依据，通过对照儒家思想，探讨三民主义同传统学术的一致性；二是围绕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而从传统儒学中寻找对接点，如民族主义方面，对接的是“大同”“攘夷”“王道”；民权主义方面，对接的是“共和”“民本”“伊周训政”；民生主义方面，对接的是“养民”“均产”“井田”。

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成果虽多，但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将孙中山的思想同传统儒学相联系，很大程度上只是言辞上的对接，不免显得表面化和简单化；第二，对孙中山所推崇的儒家思想缺乏学理上的分析；

第三，对孙中山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研究不够全面；第四，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之关系缺乏结构性的分析。

上述诸问题同时也是笔者所意图解决的，本书之写作意义也主要体现于此。具体言之则是：

（一）孙中山不是学问家，而是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三民主义同传统儒学之关系亦是文化血脉意义上的相赓相续，而不是学案式的接承。在他的著述和演说中，经常提到尧舜孔孟，但这并非意味着只有孔孟才是他的思想资源，亦非只有“王道”“大同”“民本”“均产”等概念左右着其三民主义学说的创立。孙中山作为中国的读书人，虽然只受过初步的儒家教育，但其文化血脉里所流淌的是儒家最精华的东西，即“修齐治平”。特别是，中国读书人，无论受传统思想之熏陶的程度怎样，除极个别人外，其政治观、经济观、道德观、历史观和民族观皆与儒学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因为两千多年来，儒学作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信奉的观念形态，业已形成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人们在看待社会历史问题时，几乎都是按照儒家特有的思维方式而运思的。也就是说，我们今日从事孙中山思想研究，既要考察孙中山同传统儒学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说法上的渊源关系，亦需重视作为体系化的儒学同其三民主义学说内恰性的文化血脉关系。而且这二者相比较，后者或许更为重要。

（二）孙中山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只是初步的，此种学识水平决定着他对儒学很难具有批判的眼光（而且在当时，即使那些饱读诗书者，同样没有批判的眼光）。在他的观念中，历史与思想是隔绝的。一方面，他抨击历代的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他又盛赞引导和规范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儒家学说。特

别是，他对儒家某些安邦治国的命题和原则，理解亦有不当。比如“民本”，在儒家学说里，本是集权者的话语，而孙中山则将其等同于近代西方的“主权在民”。又比如，他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必是“天下为公”，但却不知晓在儒家的话语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原则，实则正是“天下为私”的观念保障。

（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思想资源，一在中学，二在西学。而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同样是有限的。这主要表现在：（1）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主要途径是阅历（见闻）而不是阅读；（2）虽然他也阅读过一些西方人的著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等，但对西方人的历史以及近代西方诸多学说学派，则了解甚少；（3）由于对西方的认识多为见闻之知，以至于他对近代西方缺乏整体性的认识。他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却不知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形态，又是一种历史形态和社会形态，其政治、经济与文化实乃一种结构性的关系。正因如此，在他的三民主义里，往往将现代社会应予彰显的东西，如财产私有、个人主义等看作理当消除的对象。

（四）由于对近代西方学术了解有限，孙中山在取舍西方思想之资源时，不免有些失当。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有三：一是对马克思的认识。在他的三民主义学说里，特别是其早期的有关表述，孙中山并不完全认可马克思，原因不是出于他对马克思的全面了解之后的深思熟虑，而是出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二是对亚当·斯密的评价。在孙中山的主要著作中，对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持批判态度的。实际上，他所批评的并非斯密学说的主要思想，同时亦表明他对斯密学说的了解相当有限。三是对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认识，同样有误。

克氏的“互助论”是就生物界而言的，对应的是达尔文的“弱肉强食”，而孙中山则将克氏的“互助论”引申到社会历史领域。

（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则是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境况，借助中西两方的思想资源，试图一举而解决中国问题的总方案。然而，由于对中西两种文化皆缺乏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他的三民主义也就难免在理论上显得不甚成熟。而这也就是他的三民主义最终没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至少在如下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孙中山的思考是不到位的，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第一，在政治上，他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以英美为模式；在经济上，他推崇“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学说，以洪秀全和苏俄为榜样。却不曾想过，英美的政治模式与苏俄（或洪秀全）的经济模式如何能嫁接到一块呢？第二，他崇尚民主政治，试图用“主权在民”的观念和“五权宪法”的政治实践而彻底结束中国历来的专制统治，却不知他有关圣人崇拜、人分三品乃至“知难行易”诸种思想皆是对民主政治的否定性因素。

以上五点，既可看作本书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笔者应着力研究的内容。但是，指出以往学界研究的不足，或是分析孙中山本人之思想有欠周全，丝毫不影响作为革命者和思想家的孙中山的伟大形象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历史上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万事都想得周全的思想家。甚至还可以说，思想家的特征就是在思想史上占有位置但同时又留有余地。如果万事都想得周全，那么也就意味着思想史乃至人类历史的终结。作为思想家，孙中山的伟大，正是因为他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变革制定了一套崭新的社会发展方案，同时又为后继者的思想探索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发展空间。

第1章 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及其 三民主义的中国意义与世界意义

1.1 西方文化的传入与近代中国的困境

中华民族之历史上下五千年，在政治理念和治国模式诸方面，遵循的是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仿效的也一直是传说中的尧舜禹之德治主义事功。政治如此，文化亦大抵如此。在诸多外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佛教的影响最大，对中国原有文化的冲击亦最为猛烈。但是数百年的冲突与融合，佛教亦渐渐地被中国化，且从中产生出极具中国特色的禅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时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侵入，情形则大不相同，其传播方式与凶猛程度，远非此前传入的外域文化所能比拟。而诸如佛教等外域文化的传入，则又同武力无关，因而对中国王朝的统治秩序亦无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而且，历代强大的专制王权亦有能力将其归附于自己的统治秩序之中。而现在西方人的侵入，则是武力与文化双管齐下，而且这二者都是

强势的。就武力而言，西方人船坚炮利；就文化而言，西方人传入的既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又是以博爱为主旨的基督教，同古代佛教的传入亦不可同日而语。

在古代世界，各民族文化大体上都是在相对封闭的格局中产生和发展的，虽有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传播，但传播的速度和传播的方式大多是渐进性的，更谈不上世界性的和突发性的文化事件。也可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只有民族性或地区性的历史，而没有世界性的历史。世界历史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而开始的。而且，人类历史一旦由民族性或地区性而变为世界性，其结果必然是，各民族历史的独特性愈来愈难以守护，愈来愈被世界历史的大潮所淹没，一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各民族文化大多是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早已同其载体（即各文明民族）血肉不可分离。倘若通过血与火的方式硬性地将其浇灭，那么作为其载体的各文明民族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此种关系，可谓近百年整个人类最大的历史难题。特别是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尴尬和无奈。也正是因为此种尴尬和无奈，才揭开了近代中国屈辱和抗争并行的历史画面，也才可能造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5.

像孙中山这样试图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寻求民族自救之良方的思想先贤。而且也只有像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先贤，既坚定于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又具有世界性的历史视野，才可能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不迷失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航标。

1.1.1 从本土历史的视野看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晚清之前大致经过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从传说时代到商代末年为部落社会时期，西周初年至秦末汉初为贵族社会时期（亦可称作等级制社会时期），从汉代至晚清为专制集权社会时期。早在部落社会时期，中华民族同世界上各文明古国，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几乎无甚大的不同，在政治领域都是尚力不尚德，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是信奉以巫术为主体的原始宗教。只是到了西周初年，由于周公应时代需要而制礼作乐和创立一套虽为粗糙但却较为系统的政治哲学和文教理论，中国文明相对于其他各文明古国（如同时期的希腊、埃及和印度），才显现出其独特的形貌。如果说古代印度人只是沉迷于宗教信仰，对世俗历史和科学技术不甚关注，古代希腊人对宗教、哲学和科学都有着极大兴趣的话，那么古代中国人所关注的主要在政治伦理方面，所思所念都在如何安邦治国的问题上。

中国的贵族社会时期前后八百多年，大约相当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雅氏的“轴心时代”，时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而中国的“轴心时代”则早出两百年，是从周公开始的）。该时期，中国历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思想界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但是，此种自由的思想与

学术并没有将中华民族引向民主自由之路，相反倒成为秦汉之后专制集权主义的思想提炼和储备。正因如此，当刘邦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而登上王位时，新兴的汉王朝便有了较为成熟的政治思想和卓有成效的统治术。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代，以巩固王权为最高目的的文明模式发展到了经典形态，同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形成一套三位一体的自组织和超稳定的结构性体系。具体说即是：在政治上，通过君权神授理论确立王权的至上地位，同时以朝廷的三公九卿和地方的郡县制将所有权力集中于帝王一身；经济上重农抑商，盐铁官营，保护小土地所有制，且通过没收或迁徙豪强等措施打击大土地所有者，以防范地方势力坐大；思想文化上独尊儒学，确立国家意识形态，且通过征辟、察举和博士弟子等途径（特别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将所有读书人规范在朝廷允可的文教体系之中，并以此左右着士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文明形态，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是一相当成熟的经典模式。尔后虽有佛教的传入、道教的产生以及频繁的王朝更替和少数民族的短期统治，但中国文明的结构，尤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关系方面，晚清之前大体上都可视为这一经典模式的延续。

汉武帝时代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位一体的文明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年之久，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一经典模式为铁板一块。事实上，这一经典模式只是中国文明的主干（或曰主导），围绕着这一主干的是极其绚丽的历史画面和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亦可说，中国文明就其模式化而言，带有封闭性，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位一体，自成结构，互为支撑；

然而就其历史性而言，它又是开放性的，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亦为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融合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有本土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亦有邻邦文化的传入和融入（例如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任何外邦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入，都只是文化融合意义上的，既无大的文化冲突，更不可能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存延乃至主导性的地位构成任何威胁。而鸦片战争之后所传入的西方文化则不同。它的传入，不再是和风细雨般的，而是以枪炮开道，遵循的也不再是文化自身产生与传播的规律，而是西方列强因其贪婪的掠夺动机，强行地将其文化带到中华大地。也就是说，自成体系且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至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战，而且是全方位的，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尤其对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这三个大的方面冲击是巨大的。

（一）政治方面

中国自武王伐纣而建立周王朝开始，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的国家。特别是秦汉以后，王权更是至高无上，帝王同臣民的关系如同主子同奴仆的关系，一如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所说的：“（中国）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里。不像印度那样，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各阶层要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一切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① 现代学者论及古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对其专制主义统治，无不给予负面的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171。